

MODERN SOCIAL SCIENCES SERIES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現代新聞學

何光先 主編 重慶出版社



IMSSS

MODERN SOCIAL SCIENCES SERIES

G 210
20

現代社會科學叢書

現代新聞學

何光先 主編 重慶出版社

MSSS

责任编辑 张小红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刘黎东

何光先 时统宇 唐绪军 著

现 代 新 闻 学

重 庆 出 版 社 出 版、发 行（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6.25 插页6 字数152千
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500

*

ISBN 7-5366-1038-6/G · 383

定价：3.15元

出版者的话

前些年国内一些兄弟出版社出了许许多多介绍国外新知识的中小型读物。这些小册子围绕一个小的领域或一件两件事情，使用新的概念和新的方法进行研究和阐述，就像放电一样，迸出一朵又一朵的耀眼火花。这些小册子对文革后国内知识界的观念更新起了良好的启蒙作用。

但时至今日，广大读者已不能满足这些零星的介绍了。人们意识到，要成为一个现代文化人，非系统掌握社会科学各学科新的理论体系不可。而社会科学新知识的系统介绍又朝向两个方面发展：一是系统介绍各门新的学科；一是系统介绍老学科的新内容。在前一个方面，现在已引起广泛的兴趣，一本又一本的《××学》正在陆续出版。可是对后一个方面却未引起应有的注意。事实上这些老学科今日仍是社会科学中的骨干学科。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骨架仍然基本上被蕴含在这些老学科之中。为了使广大读者系统了解这些骨干学科的新内容，重庆出版社组织高层次研究机构的专家编写了这一套中级学术读物。这一套书的每一本在开始部分力求通俗，引人入胜，然后逐步升堂入室，达到较高深的境界。原来学科功底较差的读者能够逐步加深理解，而知识原较广博的读者又都有所获，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为了保证编辑质量，我们聘请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人民日报、解放军出版社和中国社科出版社等单位的一些专业编辑或编辑室主任担任特约编辑。在此一并致谢。

重庆出版社

1988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二章 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历史进程	(18)
第三章 中国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研究的现状	(33)
第四章 现代西方新闻理论及流派	(59)
第一节 报刊的四种理论及麦奎尔的补充	(60)
第二节 新闻基础理论	(74)
第三节 应用新闻理论	(93)
第四节 新闻学流派	(111)
第五章 大众传播学理论	(119)
第一节 大众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及四大理论先驱	(119)
第二节 大众传播学的基本理论模式	(137)
第三节 大众传播学的主要理论观点	(161)
第六章 对中国社会主义新闻改革的思考	(187)

第一章 绪 论

新闻学较之其它社会科学来说，是一门新兴的、年轻的科学。它在西方一些科学发达的国家得到公认也只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事情；而在我国则一直到1987年末才得到了国家的正式承认，被国家科委该年度统计年报工作文件列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中15个科学项目之一。

但是，新闻学被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已经有着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17世纪末的近代报纸的诞生地德国，一些大学生以报业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1845年，德国学者普尔兹出版了世界上最早的新闻史专著《德国新闻事业史》。1895年，德国科赫教授在海特和堡设立新闻研究所。1910年，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杰贝尔宣布：“社会有必要进行最纯粹的科学研究的第一个题目，就是新闻的社会科学。”1919年至1927年，德国不少大学相继成立新闻研究所。20世纪初，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相继成立。1929年，日本新闻学者小野秀雄最早在东京帝国大学设立新闻研究室（战后改名为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新闻学研究在德、美、日等新闻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一度呈现繁荣的局面，并在研究方向上形成两大派：一派以德国为代表偏重于理论新闻学的研究；一派以美国为代表偏重于应用新闻学的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首先发展起来的传播学，流行于西方。传播学研究的对象比新闻学更为广泛，它运用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以及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对信息传播的过程

和效果进行全面研究。很多新闻院、系因此改名为传播院、系。一些国家还成立了传播学研究中心。对于传播学的研究,不仅在—些发达的西方国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重视,而且在不少比较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以至社会制度不同的苏联、南斯拉夫等国家,也引起了不同程度的重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大众传播资料中心,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从而把新闻学的研究带进了国际现代新闻学研究的广阔领域。

在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工作萌芽于19世纪70年代。那时,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登上政治舞台、王韬、郑观应等人在从事报刊活动、批判封建专制制度、传播政治改良思想的同时,开始对报刊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甲午战争之际,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创办报刊。他们继承和发展了王韬的办报思想,并论述了报刊在维新变法活动中的使命和作用。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在海内外创办了大量报刊。孙中山等人对报刊的性质、任务和作用等问题作过比较全面的论述。20世纪初,西方资产阶级新闻学的某些观点流传到中国。1903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印行了日本松本君平的《新闻学》;1913年,史青翻译了美国记者休曼著的《实用新闻学》。与此同时,我国开始有人在日、美等国攻读新闻课程。“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引起了社会的重视,进入了新闻学的初兴时期。1918年,北京大学首先增设了新闻学课程;同年10月14日,在校长蔡元培的倡议下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术研究团体——新闻学研究会,出版了我国第一个新闻学刊物——《新闻周刊》。这个研究会在将近两年的活动中,对我国新闻学的研究起了积极的倡导作用。担任研究会会员授课任务的徐宝璜、邵飘萍分别把他们的讲稿整理成书。后来,徐宝璜著的《新闻学大意》(又名《新闻学》)、邵飘萍著的《实际应用新闻学》

(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和戈公振著的《中国报学史》等成了我国第一批新闻学代表作。自此,我国新闻学的研究工作有了新的进展。新闻教育开始受到重视,一些大学先后设立报学系或新闻学课程,并相继成立了各种新闻学术团体,进行学术研究活动,出版新闻学刊物。

作为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的解放区开始到全国解放后的今天,虽然有过不少曲折和起落,但总的是不断深入和发展的,历史上已出现过三次高峰期。第一次高峰期是30年代末期、40年代初期。它是随着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党中央对新闻工作领导的加强而出现的。第二次高峰期是1956年随着《人民日报》的改版,而引起的对新闻学一些观点的探讨所形成的,只是后来由于反右的扩大化而被夭折。目前,我国正处在新闻学研究的第三个高峰期。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拨乱反正、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行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这三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高潮的形成,既有着必然联系,又有着共同特点。它们的必然联系是:1942年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前后对新闻学所作的理论阐述,随着全国的解放、无产阶级政权的确立,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我国新闻事业从结构到任务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和发展,要求新闻理论对有的问题特别是读者需要的问题也要有所认识和发展,从而促使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新高潮;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一方面在路线上拨乱反正,否定了十年“文革”的错误,也否定了十年“文革”对新闻文化的专制主义,新闻事业需要从实践到理论有一个与此相适应的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搞活,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推动了新闻的改革,并在改革中遇到了1956年新闻理论探讨中因反右而受到批判的许多新闻理论观点的再认识,特别是遇到了现

代新闻理论的挑战，从而形成了第三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高潮。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均随着新闻改革的兴起而兴起，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而发展，这三次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高潮的形成与新闻改革都有着不解之缘。这反映了“实践呼吁理论，理论推动实践”的客观必然性，反映了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反映了现代新闻实践的行为方式对现代新闻学研究的必然要求。准确地说，我国接受国际现代新闻理论观点虽在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前后就已开始了，但真正从党报理论的研究发展到现代新闻学的研究，还是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开始的。

新闻学研究史告诉我们，尽管人类社会对于新闻学的研究已有近三个世纪的悠久历史，但它被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得到国际社会的公认只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我国更是最近的事情；而它跃进现代科学的国际行列，则是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近半个世纪才开始的，在我国尚只有10年的时间。在这里，社会政治对它固然有着不可忽视的密切关系，但决定新闻事业发展和新闻学研究进程的根本因素，还是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没有一定的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新闻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是不可能的，现代新闻学的研究也是不可能的。这是人类社会新闻事业及其新闻学研究的发展之所以晚于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现代新闻事业及其现代新闻学研究的发展晚于现代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

近40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走了一段曲折的路程，发生了几个历史性的转变。

第一个历史性的转变：从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正名到向西方新闻学的引进和借鉴。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从解放前夕起步的。1956年前后新闻学界在学术讨论中涉及的主要学术观点有：新闻价值；新闻

的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读者需要，等等。其中有的观点确有错误，1957年“反右”被当成“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予以批判。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所推行的一套文化专制主义，不仅把反右期间一些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拿出来再批判，把一些曾经因此打成“右派”的同志揪出来再斗，而且把我国整个17年的新闻工作也当成“资产阶级方向”加以否定，强令许许多多的报、台关门，大批正直的新闻工作者“落荒”、改行，仅存的报、台的新闻报道杀气腾腾，谎言连篇。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的发展开通了新的航道，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奠定了新的基础。新闻事业也迅速从“四人帮”的桎梏下解放出来，并得到恢复和不断发展，但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新闻应该如何办得喜闻乐见，广大受众的意见很多，从而提出了新闻改革的课题，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加以探讨和回答。一方面，受众要求新闻要真、要短、要新、要活，这些问题不解决，受众不欢迎；另一方面，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为1957年曾经被打成所谓“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的新闻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和读者需要以及新闻价值等观点正名，不如此就无法把新闻办得喜闻乐见；三方面，在为这些观点正名中，又涉及到了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任务、作用以及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等问题。多数人认为：从共性来说，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性质应该是“社会舆论工具”或“社会舆论机关”，从个性来说，它又具有政党喉舌的性质；它的任务是传播信息，表达舆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其具体任务要因历史条件而异，在当前就是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改革服务；任务明确了，作用也就在其中。但也有少数人只承认报刊的喉舌的功能，而否认舆论监督的功能。还有少数人只承认监督功能而否认新闻导向的功能。

对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的这种对立的认识，必然要带来

一场论战。首都及全国各新闻学会(研究会)为此组织了广泛的讨论。同时为了配合和推动新闻改革,以当时的北京新闻学会(后改为首都新闻学会)为首,于1980年发起了全国好新闻评选,第一届(评1979年新闻作品)评选就明确提出:多写新闻、写短新闻、写好新闻(这里的新闻是狭指消息),首先引导新闻界向“长”字开刀,后来又以习仲勋同志在新华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讲话中提出的“真、短、快、活、强”五字要求,作为全国好新闻评选的基本要求。从而使我们的新闻报道在改革中逐步改观。

随着新闻改革的发展,进而提出了种种问题,要求予以理论上的解释,迫使新闻界、特别是新闻理论界冲出新闻学科的范畴,并把视线转向世界,去借鉴“它山之石”,去寻找种种答案。在实践方面,穆青同志带了好头:借鉴西方新闻写作的新技法,提倡散文式新闻写作,让读者有兴趣把新闻读完,以摆脱我国当前这种呆板、笨重的新闻写作模式;接着,大家根据新闻实践发展的需要,引进了西方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全感采访、立体写作、中性新闻以及调查性报道、深度报道等写作报道形式,从而引起了我国新闻写作思维的变革。在理论方面,不仅从西方的方法论学科中引进了“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用于新闻学的研究;而且,还进一步把西方的传播学、公共关系学纳入了我国新闻学研究范畴,借鉴了西方现代新闻学中大众传播、传播五要素、社会参与、社会责任、信息、信息反馈、软新闻、硬新闻、民意测验以及调查新闻学、精确新闻学、比较新闻学、发展新闻学等一系列观点,加以分析、鉴定、创造,补充了我国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知识库,促进了新闻观念的更新。

但在引进西方新闻学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开始蔓延起来。在国际资本主义的敌对势力和国内反动分子处心积虑地策划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有人把新闻说成是超阶级、超

国界、超政治的东西，散布说西方新闻才是真实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闻多半是假的，并进一步妄图把我国社会主义新闻改变成为顺应西方和平演变的工具。这种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直接导致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的新闻错误导向，它还使许多人盲目相信了“美国之音”连篇累牍的谎言，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平息暴乱之后，党和政府组织新闻工作者进行总结，反思和学习。许多新闻学研究者考察了“左”的和右的两方面的教训，开始探索新的道路：新闻学如何在维护、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中前进，既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又要正确扬弃西方新闻学的观点。这些变化使我们看到了新闻实践的活跃，新闻理论研究的进展，也看到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信心和希望。

第二个历史性的转变：从书斋里“纸上谈兵”到走向社会指导新闻实践。

我们的学风尽管最讲究理论联系实际，也尽管新闻学的实践最强，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对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研究，有些人却往往只是关在“书斋”里啃书本，或关着大门“纸上谈兵”，或打点“笔墨官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许许多多从事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工作的同志，潜心探索，大胆实践，本着“探索规律、追求真理”的精神，跳出书斋，并将切实可行的理论付诸改革付诸实践，使一系列理论问题得到了论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尽管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性质的争论并未完全统一，但多数人把共性和个性结合起来、一致起来，既从“舆论工具”论的角度对新闻改革进行宏观思考，又从“喉舌论”的角度探索新闻体制的改革。恢复和创办了大量的各种不同性质的专业报，其中有科技报、企业报、经济信息报、生活服务报、文化娱乐报以及校报、科普报等等，多达10多类，占我国现有报纸总数2600多家中

的80%以上；他们有的属于政府性报纸，有的属于团体性报纸，有的属于企业性报纸，主要职能是传播各种信息，监督各个行业工作的实施。从而在我国形成了一种以党报为核心的多类型、多层次的报业结构，改变了人们过去的单一的党报观念。

满足受众需要，必须强化新闻的服务性。但在我国的传统理论中，只注重新闻的指导性而排斥新闻的服务性，并把指导性仅仅理解为指令性，认为无产阶级新闻工具主要是对上负责，对下只是传播党的政策，发布各种指示、命令，以指导工作为己任。因而新闻报道领域狭窄，信息量少，新闻价值低，并在报道中常以教训的口吻指东划西，令人逆反、乏味，使新闻指导性与新闻服务性对立起来了。其实，新闻指导性是寓于新闻服务性之中的。因为，提供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生活等信息是一种服务，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信息也是一种服务；何况新闻服务性同真实性、公开性、新鲜性一样，是新闻区别于它事物的根本特性，正是有了服务性才使新闻传播成为人类社会求生存、谋发展的亲密伙伴。在商品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服务性就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只有加强，不能削弱或否定，否则我们的新闻就会失去社会性，失去受众，失去存在的价值。各报、台从实际出发，坚持和发挥了新闻这一根本特性，普遍增加了各种强化服务性的专栏、节目，更创办了各种强化服务性的专业报，克服了由于单一指导性观念和传统理论所给新闻报道带来的信息匮乏的危机。

全面发挥新闻的功能，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改革形势要求新闻工作者迫切解决的一个实践问题。新闻功能总的是传播信息、表达舆论，具体则包括了发布消息、传播思想、反映舆论、开展批评、监督官员、介绍知识、交流经验、提供娱乐、刊登(广播)广告等等功能。过去，由于传统思想的影响，新闻的功能发挥很不充分，大都重政策报道，轻信息反馈，于今处于“信息爆炸”时代，国家全面改革，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人们生活多样

化，全面发挥新闻功能势在必行。

也要看到，在实践中在少数人一头栽进动乱和暴乱之中。动乱后多数人都已看清，新闻研究走出书斋，面向社会，要结合的是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而不应该是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复辟实践。新闻改革的推进和新闻作用的全面发挥都必须充分考虑到我们的国情：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初创，缺乏经验，优越性未充分显露，国际资本主义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新闻是他们推行和平演变政策的主要工具。他们发誓要打赢这一场没有硝烟的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战争。同时国内受众文化水平一般较低，对国际间的是非一时辨不清。因此新闻改革只能逐步推行。

第三个历史性的转变：从“新闻无学”到被国家正式作为一个学科得到承认。

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的研究，尽管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且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和人类优秀的新闻学的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而新闻学作为一个学科却长期未得到国家的正式承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闻工作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大学设有新闻系专业，新闻事业得到不断发展，在社会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但这仅仅是作为一种事业、一项专业来看待的，而未把这一事业的学问作为一门社会科学来对待。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都设立了从事新闻学研究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一些重点大学新闻系开设了硕士研究生的学制。

几年来研究认定：新闻事业的形成和发展是形成新闻学的基础和依据。正如蔡元培先生早在1919年为徐宝璜的《新闻学》立序中所说：“凡学之起，常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以后。”这里且不说人类新闻事业的形成、发展及其宏大规模，只要屈指算算我国当前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规模就十分明白了：报纸2600余种，广播、电视台…2900多座，新闻院系(专业班)40多个，通讯社及其分社近100

个……总共近40万新闻大军。这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研究的强大对象，也是决定我们新闻有“学”的基础。

几年来还研究认定：我国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已具有独立反映研究对象和客观规律性的知识体系。这是新闻有“学”的基本标志。据不完全统计，从20世纪20年代前后起到1987年底止，我国共出版了各种新闻学论著、译著及新闻业务读物约1600部，其中解放前出版约150部，解放后出版1400余部（含港、台出版的约500部），比解放前的30多年增加了近10倍。在这近1600部新闻学读物中，虽然资产阶级新闻学读物占了近三分之一，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读物约占三分之二，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本观点和基本规律在这些著作中已经得到探讨和阐述。这些论述尽管有的尚属初步探讨，但它已经形成现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知识体系，不仅包括理论新闻学、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历史学，而且还新开拓了新闻科学（有的叫它新闻边缘学），足以独立反映研究对象及其规律性。而且到目前为止，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已经基本趋于一致的认识。

什么是新闻？虽然有近十个答案，但基本上仍难超出陆定一同志的定义：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且经过现代新闻实践的检验，这一定义是切合实际的，是具有生命力。

区别于它事物的新闻根本特性也得到了明确。与过去传统理论所不同的是，除公开性、新鲜性、真实性之外，又增加了一个服务性。并且认为，服务性之所以被认定为新闻有生具有的根本特性，不仅因为它历来是人类求生存、谋发展的伙伴，而现在又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工具，新闻离开了服务性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条件。

争论最大、争论时间最长的新闻事业的性质问题，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后已基本统一于“社会舆论工具”或“社会舆论机关”这一概念上来了。当然，“社会舆论工具论”是指新闻事业的共性而

言的，与此同时，在有阶级的社会（包括阶级消灭而政党仍然存在的社会）里，新闻事业还有其个性，即作为党的新闻事业又必然是政党的喉舌。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新闻事业必然要被一定阶级所控制、所利用、为一定阶级服务，成为一定政党的喉舌，这是无疑的。因此，现在有人把新闻事业的性质“社会舆论工具论”与党的新闻事业性质“喉舌论”对立起来，其实这就犹如把“人”与“男人”或“女人”对立起来一样。这是不需要把它当成一个问题来看待和分辨的。此外，当前关于“喉舌论”与“耳目论”之争的问题，这也是关于党的新闻事业性质之争。不过这两者均是形象的比喻，强调“喉舌”并不能排斥“耳目”，强调“耳目”也不能排斥“喉舌”，否则，就不是一个完好的“人”，不是聋子、瞎子就是哑巴了，这自然不是双方争论的本意。主张“耳目”论者，其目的还在于否定“喉舌”论，这就完全错了。

由于新闻事业性质问题的基本统一，对于新闻与宣传的关系也有了大致统一的认识。即新闻与宣传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联系的是，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新闻是一种宣传，也被当作了一种宣传，并起到了宣传的作用，这是现实；但新闻不全等于宣传，新闻与宣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新闻以客观事实为反映对象，要求事实真实、新鲜，并为受众服务；宣传则以宣传者的主观意图为反映对象，要求观点鲜明，事实只为了说明观点，并为宣传者的主张服务。

新闻价值在新闻报道中具有重要地位。对于什么是新闻价值，虽然有上百种回答，现在也基本接受了这样一种说法：新闻价值是客观新闻事实适应社会需要的功能（或素质）；其要素来源于客观事物变动的广度和深度之中；新闻的社会效果则取决于新闻事实固有的价值和对其价值的实现程度。但在现阶段（有阶级的社会里）要取得新闻的最佳社会效果，需要实现新闻与宣传的双重价值，即新闻既要具有新闻价值，又要具有宣传价值。只是在这

里，宣传价值是从属于新闻价值的，一条新闻只有新闻价值，无疑可以成为新闻，并取得一定的正效果或负效果；一条报道只有宣传价值而无新闻价值，则是不能成为新闻的，也难以取得应有的社会效果。

新闻价值的大小与新闻所包含的信息数值密切相关，既与信息量有关，又与信息质有关。信息，在传统新闻学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今天“信息爆炸”的商品经济社会，不仅已被全社会所重视，也已被我们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所接受，并且是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曾由信息这一概念所引起的争论是：是所有的新闻都具有信息还是单有“信息性新闻”？这个问题现也得到了基本统一。新闻信息是信息中的一种，即客观事物新近运动状态的反映；它是所有新闻必备的素质，凡不具备信息素质的就不能成为新闻。因此，“信息性新闻”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否则，按照这种说法就还有一种“非信息性新闻”，这显然是不对的。

这些基本理论观点的统一，反映了新闻传播的规律知识性体系的形成。其中包括了新闻规律、新闻事业规律和新闻工作规律，也反映了这些规律中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比如，新闻必须真实的原则，反映了新闻必然受客观事实制约的规律；新闻要新的原则，反映了新闻必然反映社会最新事态的规律；新闻的公开性原则，反映了新闻必然反映人们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规律；新闻的服务性原则，反映了新闻必然满足社会需要的规律性；新闻的社会效果原则，则反映了新闻的价值规律性；等等。同时，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新闻既具有普遍规律，又具有特殊规律。比如，新闻选择的倾向性，反映了阶级社会统治阶级控制的新闻机构，必然要表现出舆论的阶级倾向性的特殊规律；新闻的双重价值（即新闻价值与宣传价值），反映了阶级社会新闻的社会效果必然受到阶级需要制约的特殊规律；等等。由于对这些传播规律的认识和运用，从而把握了新闻传播客观规律性的知识体系。